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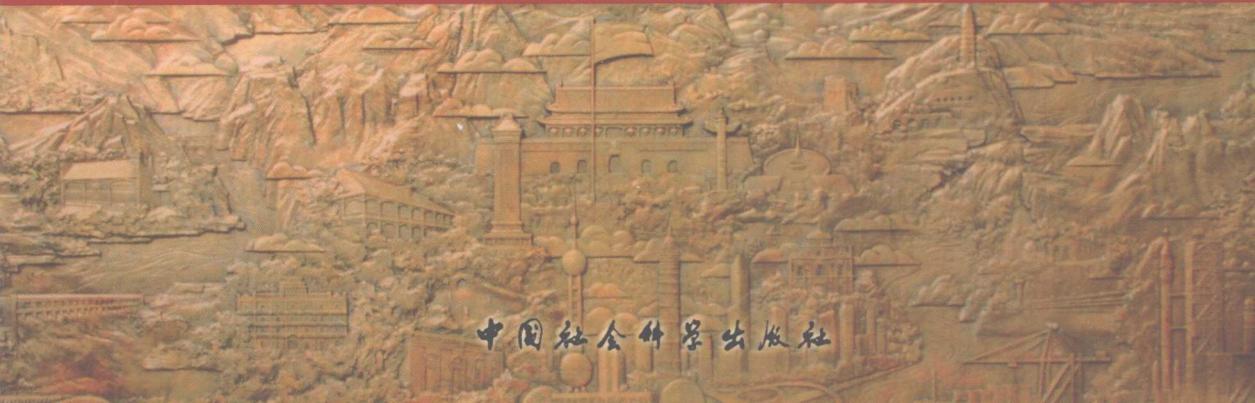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



当代人与当代史探研

DANGDAIREN YU DANGDAISHI TANYAN

田居俭/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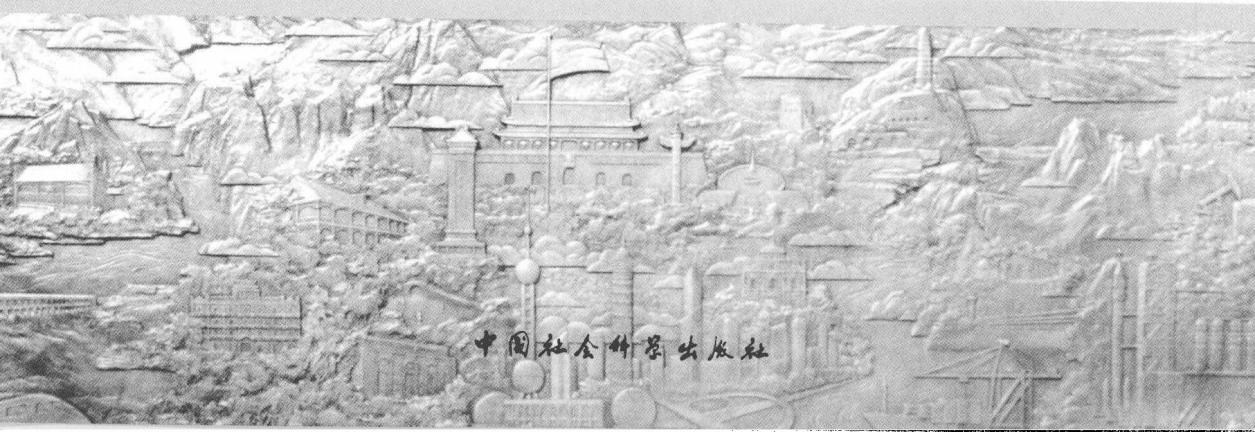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



当代人与当代史探研

DANGDAIREN YU DANGDAISHI TANYAN

田居俭/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人与当代史探研 / 田居俭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

ISBN 978 - 7 - 5004 - 8228 - 4

I . 当 … II . 田 … III . 中国—现代史—研究
IV. K27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6816 号

责任编辑 冯广裕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5.5 插 页 2

字 数 390 千字

定 价 5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

编委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主任：	金冲及			
委员：	于沛	朱佳木	齐德学	李文海
	李捷	陈祖武	张启华	张星星
	张海鹏	何理	沙健孙	武力
	孟昭宇	赵剑英	梁柱	程中原
	董志凯			

前　言

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成果。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为了庆祝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节日，同时也是为了检阅国史研究的成绩，促进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从长期从事国史研究的学者中遴选了一批作者，将他们的自选文集汇编成这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大力支持，予以出版。

本丛书以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主，每本文集的书名由作者自拟，目录按照发表时间顺序或专题排列，书后附后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陈奎元同志于 2009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上的讲话，对如何正确看待和研究新中国 60 年的历史，作了深刻的阐述。这篇讲话与本论丛的编辑宗旨完全一致，经征得本人同意，作为总序放在每本文集的卷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编委会

2009 年 9 月 30 日

总序

正确认识新中国 60 年，为推动 国史研究作出新贡献^{*}

陈奎元

回眸新中国的 60 年，是光辉灿烂的 60 年，是令共产党人、全中国人民足以自豪的 60 年。以 60 年为着眼点，新中国取得的成就与中国历史上各个兴旺的时期比，与世界上资本主义各个大国开国以后的历程比，不仅是毫不逊色的，也是无与伦比的。在国际共运史上，18 年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倒塌，苏联共产党在压力下自动解散、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土崩瓦解，国家解体，人民陷于困境，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自溃，形成历史的倒退，这是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惨痛曲折的一页。那时中国也面临严峻的考验，在党中央的有力领导下，安然渡过 1989 年的政治风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站在时代的潮头，正像宋词中所描写的“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①，党中央坚如磐石，坚持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坚持了独立自主的传统，走向改革和发展的新里程。到今天，回顾 60 年的风风雨雨，应当相信和肯定，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中国人民奠定的中国社会主义江山根基是牢固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成功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

* 这是陈奎元同志 2009 年 8 月 26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成立大会上讲话的节选。

① (宋) 潘阆：《酒泉子·长忆观潮》，载《唐宋名家词选》，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52 页。弄潮儿，《全宋词》作弄涛儿。



中央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就是显著的。假如当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降下自己的旗帜，在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卑躬屈膝，今天有谁会来研究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何以被人称作“金砖四国”之一？中国怎能令世人刮目相看？中国13亿人会面向什么样的未来？

如何对待中共的历史，如何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最严肃的科学事业，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研究国史要求政治思想性强，要讲政治、讲正气，要秉持古来史学家优良的道德操守。有关国史的著述一字千金，决不允许凭个人好恶臧否革命领袖和其他先烈。“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轻薄为文、信口雌黄，不但对先人的不敬，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捉弄。国史研究工作者应当善于明察，并且作出令人信服的阐述。

经历60个春秋，革命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选择也逐渐淡漠，有些人对国家取得的成就不知是从哪里来的，看到有些不尽如人意处，也不知根源何在，看不清中国未来的前途应当向什么方向发展，甚至发生某些误解，这并不奇怪。如果我们听信那些告别革命的呓语，这种种疑惑就会使人们疏远并最终脱离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一千六百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统治下的凉州地方首领张骏不忘故国，他在向东晋皇帝的上疏中说：“先老消落，后生不识，慕恋之心，日远日忘。”^①这几句话用之于今天，足以发人深省。我们国史工作者应当弘扬前辈的志愿，启发人们对革命历史的了解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引导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不要日远日忘而是日久弥新。

^① 《资治通鉴》（卷95，晋纪17，成帝咸康元年）第7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004页。





应当对中国封建主义加强研究	(113)
要深入剖析封建主义残余	(124)
简论清官生存的社会土壤	(130)
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136)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145)
史学著述要深入浅出	(148)
论人立传切忌讳言	(151)
影视编导应与史学家联袂	(153)
论良史工文	(155)

■治当代史篇(上)■

当代人要治当代史	(181)
《当代中国史研究》发刊辞	(183)
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管见	(186)
略论国史与地方史的辩证关系	(190)
用影像再现共和国的年轮	(197)
党史研究者要关注社会史研究	(204)
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	(208)
当代社会史是国史研究亟待拓展的领域 ——访当代中国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顾问、研究员田居俭	
	(217)

■治当代史篇(下)■

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考察	(225)
开国奠基的1949年	(265)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正斗争 ——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85)
抗美援朝运动与“三视”教育	(301)
墨写的诡辩无法掩盖血写的罪责 ——评日本文部科学省终审的《新历史教科书》	(309)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	(320)
共和国初创辉煌的七年	(329)
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改进体制的探索	(343)
学习陈云理论思维的札记	(358)
陈云的人格魅力	(369)
首倡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大贡献	(382)
后记	(393)



学 史 篇



论 学 史

《光明日报》编者按：江泽民总书记今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殷切希望各级干部和全党同志“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他还着重讲了关于学习理论、学习现代经济知识、学习科技知识和学习历史四个方面的问题。本报今天发表的这篇署名文章，就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如何学史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文章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又是具有尊史、学史和治史传统的民族。历史知识、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哺育了一代代中华儿女。为了实现跨世纪的发展目标，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响应江泽民总书记的号召，努力学习历史，从历史中吸取营养，提高自身素质，开拓视野，鉴往知来。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又是具有尊史、学史和治史传统的民族。自古以来，历史知识、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就像慷慨无私的阳光和润物无声的雨露，哺育了一代代中华儿女。无论是站在时代潮头弄潮的领袖人物，还是与他们同舟共济的平民百姓；无论是满腹经纶的学界泰斗，还是目不识丁的山野渔樵，莫不受益于历史——这取用不尽的精神财富。一代代的中华儿女，又在社会实践中用新的知识、智慧和经验丰富和完善博大精深的历史，使它薪火相传。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历史的哺育。然而，为了实现跨世纪的发展目标，一定要自觉地把历史作为必修课，从中摄取营养，提高自身素质，做一个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诚然，由于社会分工不同，不必要求每个领



导干部都成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学家，但每个领导干部都必须学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因为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管你所在的部门大小，也不论你的职务高低，在工作中都要遇到和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尽管历史不能重演，但历史却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能给现实以参照和借鉴。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各级领导干部在实践中都要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的那样：“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①

一

各级领导干部何以要把历史列为必修课？实践证明，历史能教人遇事温故知新，慎思明辨，判断是非，或法或戒，决定行止。历史对于培养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和情操，对于国家的治乱兴衰、得失成败，均有不容低估的作用。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就揭示出这一真谛：史之为用，“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

中华民族向来把修身与从政视为一个整体，强调二者相辅相成。《论语·颜渊》说：“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把这些话归纳起来，借用焦裕禄的一句名言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基于上述原因，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提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大畜》）意思是说，善于修养的人，能够经常从先贤的嘉言懿行中学习智慧和道德，用以培养和完善自身的品格。历代英雄豪杰和仁人志士，就是自幼接受历史的熏陶和教育，树立爱国、报国和强国的远大志向，并在社会实践中按照历史的昭示把自己造就成为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人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页。



鲁迅曾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① 这种源远流长的“中国的灵魂”，具体表现为历代社会精英追求和倡导的各种崇高精神。如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的“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等等。这些精神汇集在一起，便成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相继的国魂意识，成了华夏儿女立身砥行的精神支柱。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和改造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人，比以往任何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更重视以史育人。他们用共产主义理想把“中国的灵魂”升华到更高更新的境界，用以教育干部和党员加强自身修养，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语）这就是定为立党宗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在这种精神哺育下，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神州大地上涌现出千百万为国奉献、为民造福的英才。他们在战场上是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的楷模，在刑场上是铮铮铁骨、坚贞不屈的英雄，在建设中是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典范。

江泽民同志在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时指出：“古往今来，一切有志有识有为之士，都能够把握自己，以不沉醉于金钱、美女和权力为诫，而凡是沉迷于声色犬马，没有不玩物丧志的。这方面的古训很多，值得重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些党员、干部放松了自己的学习、修养和改造，头脑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少了，而个人主义的东西多了，受腐朽思想的影响多了，对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已分辨不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不迷失方向、走到斜路上去的？”^② 这是告诫党员和领导干部，为了保证党

^①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②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9、605页。

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除了要在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中经受锻炼外，还要自觉地学习历史，以人为镜，以事为镜，时时处处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保持清正廉洁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经得起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多作贡献。

二

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历史列为必修课，更是出于从政的客观需要。中国有一条古训，叫做“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用时下的话说就是，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都要以史为鉴。古代先哲提出这样的治国主张，是因为他们从朝代更迭中认识到前车之覆，后车当鉴。西周初年，因成王（武王之子）年幼而由周公（武王之弟）摄政，待成王成年亲自理政时，周公叮嘱他：“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尚书·召诰》）。意思是说，你要治理好国家，不可不借鉴夏、殷两代的经验教训。由于周初王公重视以史为鉴，西周出现了奴隶制时代盛世“成康之治”。南北朝时期羯族的石勒出身于贫苦家庭，少年时被晋朝官吏掠卖为奴，受尽欺压。后来举旗造反建立起后赵政权，在短短十数年统一了黄河流域。他之所以能从奴隶成长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勤于学史和善于用史。他不识汉字，却好学史。即使在戎马倥偬中，也坚持要身边的汉族儒生为他读《左传》、《史记》、《汉书》等史书。他学史还善于联系现实，“每以其意论帝王善恶”，总结前朝经验教训，借古鉴今。一次，当读到楚汉相争中郦食其劝刘邦封王“复立六国后”，他认为此举不足为训，便说：“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待读到张良以八条理由反对分封时，他深以为然，又说：“赖有此耳！”（《世说新语·识鉴》）由于他在政治生涯中亲身体验到了史学的经世作用，所以称帝之后破天荒在朝中设立了“史学祭酒”的官职。唐太宗为了“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卷五四《国史部·恩奖》），也敕命魏征等重臣鸿儒悉心修史，用30年就修成了八史，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北史》和《南史》，占了后来二十四史的三



分之一。唐太宗还亲自为《晋书》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和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史论。由于唐初君臣重视以史为鉴，唐代出现了封建时代的盛世“贞观之治”。

以史为鉴，立国治国，更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优良传统。60多年前，当抗日战争的烽火还在祖国大地燃烧的时候，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在他的号召和带领下，全党通过学习历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百年历史，从中国国情出发，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性质和转变，制定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以及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个步骤的战略目标：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在这些战略决策的正确指引下，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通过解放战争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也积极倡导学习历史。他把懂得历史看作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强调在学习理论的同时“也学点历史”。他认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他有一句名言是：“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领导全党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祖国统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234—235、271页。